

1901

武昌文史

第11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武汉市武昌区委员会编

武昌文史

第 11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武汉市武昌区委员会编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准印证号

[1995]武新出图内字第 054 号

武昌文史

第 11 辑

编 辑:政协武汉市武昌区委员会

印 刷:武汉邮科院印刷厂(武汉市红军印刷厂)

开 本:大 32 开

字 数:170 千字

印 数:1000 册

工本费:8.50 元

目 录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时华武(1)
抗战史实	
洗星海与武昌抗战歌咏.....	杨昌江(3)
武昌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	涂上庵(10)
“一二九运动”两周年纪念会.....	余秋阳(17)
青年救国团在武昌.....	万江红(20)
抗日救亡在武大.....	刘小亮(24)
抗日扩大宣传周.....	余秋阳(30)
宣传抗日到金口.....	万澄中(33)
忆在武汉战干团受训时的三件事.....	姜志远(35)
抗战初期的武汉防空.....	李修鲁(38)
武昌沦陷前的疏散工作.....	万江红(42)
汉口沦陷初期简况.....	李健侯遗稿(46)
武汉太空战.....	屈德寿(49)
抗战期间见闻.....	余有瑞(58)
首歼日机两架的周庭芳.....	李士倬(62)
夜炸寇车亲历记.....	刘一曙(64)
武大师生支援抗战事迹点滴.....	刘敬黄(68)
武昌英烈四则.....	余秋阳(70)
武汉沦陷前后人民历乱见闻.....	濮骥之(72)
日寇在武昌的暴行.....	王美英(78)

沦陷时期白沙洲难民区	吴文珊(84)
日伪时期的南宪兵队	邹田清 胡传耀(88)
李洪发勇毙日本色狼	高春庭(93)
日寇在武昌肆意拆毁民房	刘昌浩(97)
日寇罪行二三事	万咸琛(100)
逃难琐忆	袁复心(103)
不忘南京大屠杀血泪史	徐世江(106)
侵华日军武汉投降记	王美英(111)
在欢庆抗战胜利的日子里	熊 辉(115)

改革纪实

徐家棚医院实行“公有私营”改革纪实	
.....	吴西军 张卫国 万子余(120)

工商史话

忆先父答容川	答先进(125)
“公私合营”前的曹祥泰商店	武 富(131)
武昌及湖北省的电力工业	喻昌斌(138)

文化教育

清末民国武昌社会教育梗概	余常海(142)
武昌解放初期的社教工作	傅 骥(149)
抗战初期在武昌出版的报刊	余常海(152)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	陈文国 张传慈(163)
“鹤联”悬案	徐 岳(170)

市井变迁

陆家街地陷	朱尚武(172)
-------------	----------

漫话“三层楼”	濮世谷(176)
沧桑徐东路	冷天樵(179)

难忘岁月

五十年代在区委工作的回顾	张怀慰(183)
--------------------	----------

民俗风情

忆武昌城的风味小吃	陈宛茵(193)
长桥游乐图	
——百万市民游览武汉长江二桥漫记	冷 静(196)

《武昌文史》创刊十周年纪念座谈会	本刊编委会(202)
------------------------	------------

编后	编 者(204)
----------	----------

小 资 料

武昌历史上第一部《教育志》面世	余 寒(37)
蛇山炮台	徐 岳(41)
重建的武昌区宣传橱窗长廊	余 寒(69)
以“红楼”为题的新撰联	李西亭供稿(87)

封面照片说明:

本照片系武昌区政协、区委统战部、区台办、区侨办、区民建、区工商联的机关干部在《武昌区各界人士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大会》上演出大合唱,市政协谭定九副秘书长即兴参加。指挥:区政协前主席彭树襄。摄影:杨汉林。

时华武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 50 周年。我们以无比激动的心情，纪念这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反侵略战争的辉煌胜利。

半个世纪以前，我们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社会各阶层人士和海外侨胞，进行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斗争。这是一场气壮山河、功垂青史的伟大的爱国主义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是极其野蛮和残酷的战争，它给中华民族造成了空前的浩劫。但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同仇敌忾，用血肉之躯筑起了坚不可摧的长城。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抗日战争的胜利，证明了中国国民党是抗日救国的中流砥柱。没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没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整套正确的政治主张和军事战略策略，也就不能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解放战争所取得的第一次完全的彻底的胜利。这一胜利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落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1949 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与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分不开的。

国家必须富强，落后就会挨打。这是被历史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敢于发动侵华战争就在于当时的中国国弱民贫。“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民世代梦寐以求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人民过去那种任人

欺凌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可以满怀豪情地预料,21世纪的中国,必将是一个更加繁荣更加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这种历史的悲剧,中日两国人民都应世代永远铭刻在心。日本的广大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应该永远发展下去。但是,时至今日,在日本国内仍不时有人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遮遮掩掩。有少数人总是刻意歪曲历史,甚至无耻地美化那场侵略战争,妄图洗刷战争罪名,为军国主义招魂。法西斯主义思想在日本阴魂不散。这是世界人民绝不能允许的,也是不能不引起我们注意和警惕的。历史不容歪曲,事实不容抹煞。少数人的胡言乱语必将被人们所唾弃。今天,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重温抗日战争的历史,就是要教育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忘国耻,不忘我们的前辈为民族的存亡而付出的惨重代价,认真汲取宝贵的历史经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为创造中华民族更加辉煌的明天,为人类的永久和平而努力奋斗。

(本文作者,系中共武昌区委副书记)

冼星海与武昌抗战歌咏

抗战初期,抗日救亡的歌声响彻武汉三镇,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始终站在这场抗战歌咏运动的前列,为推动武汉和全国的抗战歌咏运动作出卓越的贡献。他的许多活动都与武昌有关。

一、培养抗战歌咏力量

1937年8月淞沪会战开始后,冼星海参加洪深领导的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内有金山、王莹、黄自等人),离开上海赴内地宣传抗战,于当年10月初来到武汉,集体住在汉口精武体育会。

一到武汉,他便和救亡演剧二队的同志一起为推动武汉的抗日歌咏运动奔忙。首先组织辅导当时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的歌咏团体。经他组织辅导的歌咏团体有几十个之多。他的一个记事本里记了他常去的歌咏团体的名称和去教歌的时间、地点,如海星歌咏队、青救歌咏队、孩子剧团歌咏队、女青年会歌咏队、华北歌咏队等。这时他的活动主要在汉口,但也常到武昌来。

当时武汉最大的抗日民众团体是“青年救国团”,由中共湖北临时省委领导,有两万多人,遍及武汉及省内工农商学兵各界。青年救国团总团负责宣传工作的赵启海(原为北师大学生)组织了一个歌咏团体叫“青救歌咏队”,吸收了不少青年参加,经常到伤兵、难民、迁厂工人中去进行慰问演出、教唱抗战歌曲。冼星海经常从汉口过江来武昌,为青救歌咏队指挥教唱,地点就在三道街青年救国团总团部。

后来,青年救国团为了培养抗战歌咏运动骨干,又组织了一个歌咏干部训练班,从武昌各抗日群众团体中抽一些音乐爱好者来

学习,地点在武昌胡林翼路(今民主路)。由于青年救国团的赵启海与冼星海很熟,就由他邀请冼星海来这个歌干班教唱歌、指挥和作曲。又由于冼星海在汉口那边以主要精力辅导的歌咏团体叫海星歌咏队,故这个歌干班也以“海星”为名,称“海星歌咏队武昌队”,或“海星歌干班”。海星歌干班每期约两周,吸收学员约20人,共办了五、六期,培养学员百余人。冼星海对这个歌干班十分重视,常来教课。

冼星海初到武汉时尚无工薪收入,生活清苦,有时连往返武昌汉口的过江钱都没有,常常买两个烧饼放在衣袋里,饿了就吃两个烧饼算一餐,但他对武昌的青救歌咏队和海星歌干班的辅导工作是风雨无阻,到时必来,使大家很感动。他教大家唱他作的歌《顶硬上》(这是一首广东劳动号子歌,歌词是他母亲过去口授给他的)、《起重匠》(这是 he 到武汉后不久去大冶石灰窑下矿井参加劳动时,根据矿工们的劳动号子创作的一首歌)。冼星海教得很认真,要求大家体会歌中的劳动感情和节奏,唱出劳动大众雄厚的力量,因为劳动大众雄厚的力量正是抗战胜利的保证。

除教唱歌外,冼星海还教指挥法,包括二拍子、三拍子和四拍子几种常见打法,使大家学了以后都能出去到别的歌咏队教歌、当指挥。大家跟着他的示范学打拍子,然后每人轮流到队前指挥大家唱一个歌。所指挥的歌曲是大家熟悉的,如《救国军歌》、《祖国的孩子们》等。每人指挥一歌之后,冼星海便对起拍、结束、强弱、姿势等方面的问题加以纠正。他提醒大家,指挥时切忌紧张与姿势不大方,要向练唱的人讲解歌曲的内容、情绪、哪里该强、哪里该弱,特别强调指挥时要用眼神暗示或以指挥棒直点唱错的人,促其注意。

歌干班的学员还从冼星海那里得到作歌的训练。例如,赵启海就和冼星海合作写了《祖国的孩子们》等抗战歌曲;歌干班的学员在冼星海、赵启海指导下,集体创作了《海星歌干班班歌》(这支歌以后成了海星歌咏队的队歌)。几十年过去了,原歌干班的学员

现在已七、八十岁了，可是他们仍能准确唱出这支班歌，可见对它印象之深了。

在这些教唱辅导活动中，大家都感到冼星海对人非常热情友爱。虽然他讲的是一口很不流利的广东国语，别人听起来颇感费劲，但他那乐观幽默的性格，总是鼓励人上进的态度，老远见到熟人就首先打招呼的习惯，感染了每个人。不管哪个人找他在本子上签名留念（这是当时的风气），他都很爽快地满足别人的要求，有时给别人写几句鼓励抗战的话，有时给别人划了五线谱，再题上他作品中的一句，有词有曲，如“前进，中国青年！”

二、组织大型抗战歌咏集会

1938年1月，冼星海鉴于武汉和全国众多抗战歌咏团体缺乏联系，致使抗战歌咏运动不能有计划有组织地大规模发展，而第一个出来发起组织“中华全国歌咏协会”（简称“全国歌协”）。他联络张曙、夏之秋、刘雪庵等人在汉口精武体育会开了筹备会，又在武昌实验中学（西卷棚）设立筹备会临时办事处。1月17日全国歌协在汉口正式成立，冼星海担任当天大会主席。登记参加全国歌协的歌咏团体有二、三百个之多，其中也包括武昌的许多歌咏队，如青救歌咏队、武昌工人歌咏队、武昌儿童歌咏队等。

1938年春，国共合作恢复北伐时的军委会政治部，政治部下辖的第三厅主管抗战宣传（厅长郭沫若），冼星海与张曙、赵启海都在三厅的艺术处（处长田汉）戏剧音乐科（科长洪深）工作。三厅于4月1日正式成立，机关设在武昌县华林（现市十四中），冼星海便也从汉口搬到这里来住，与王式廓、钱远铎、邢逸梅四人共居一室。大家工作很忙，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没有星期天。

如果说1937年秋冬是冼星海初到武汉推动抗战歌咏运动的准备阶段，那从1938年春全国歌协和三厅成立到同年秋初冼星海离汉去延安，则是他推动抗战歌咏运动的发展阶段。他在三厅有了固定的工作岗位和薪金，工作和生活有了保障，武汉的众多歌咏

团体经过半年来的训练，歌咏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这些条件都使冼星海可以放手大干。他和张曙等同志以全国歌协和三厅的名义组织了许多次震撼人心的大型抗战歌咏集会，这些集会也都有武昌的歌咏团体参加，如1月在汉口光明大戏院举行的“援助冀北人民抗日游击队音乐大会”，3月在汉口江汉关前举行的“万人歌咏大合唱大游行”，4月在武汉三镇举行的“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歌咏日”，5月在武昌及汉口举行的“雪耻兵役歌咏会”，7月在汉口总商会礼堂举行的“七七抗战一周年献金音乐会”，8月在武汉三镇举行的“保卫大武汉歌咏火炬大游行”等。

1938年3月的一天，“万人歌咏大合唱大游行”在汉口江汉关前举行。当时上海、南京均已沦陷，徐州会战正激烈进行。那天傍晚，来自武汉三镇的众多歌咏队上万名队员为鼓舞抗战聚集在江汉关前，真是人山人海。赵启海带领武昌来的歌咏队居中列成纵队，张曙带领汉口歌咏队在日清轮船公司那边居右列成纵队，汉阳来的歌咏队则居左列成纵队。在几架巨型电影聚光灯的强光照射下，大会开始了，冼星海跨上关楼前的石坡，振臂指挥万人同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大刀进行曲》……他是歌咏总指挥，下面各片各歌咏队的分指挥也随着他指挥的节拍各自指挥自己负责的片、队同声齐唱，歌声带着对日寇的仇恨和保家卫国的决心，象排山倒海般沸腾。大合唱之后是大游行，冼星海继续在游行队伍中指挥，各片、各队的指挥也继续按照他的指挥节拍指挥各自的队员边行进边歌唱。这时有人将一辆板车推到冼星海身边，让他站上板车指挥，他那挺立振臂指挥的姿态，表现出满腔如火的爱国激情。队伍从江汉关出发，经江汉路、统一街、到民族路孙中山铜像，又折回现在的中山大道，再穿过日、俄、德、法、英租界，回到江汉关，沿途受到市民热烈欢迎。直到夜深，汉口、武昌和汉阳的歌咏队才分头散去。

1938年4月初，三厅刚成立即举行声势浩大为期七天的“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有“戏剧日”、“电影日”、“美术日”、“歌咏

日”、“游行日”等，此时恰逢徐州会战台儿庄大捷，中国军队四十万人和日本侵略军七、八万人在山东南部台儿庄一带激战，中国军队消灭日军2万多人，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消息传来，武汉军民欣喜若狂，三厅便把宣传周最后一天的“游行日”提前。4月7日傍晚，夕阳西下的时候，武昌的民众从四面八方潮水般涌向黄鹤楼和汉阳门江边一带，人们举着火把，挤得水泄不通，火光照红了江边，唱歌声、爆竹声、口号声仿佛要把天空炸破，军乐队还奏起了震人心弦的进行曲。……。在郭沫若厅长以宏亮顿挫的声调致了简短有力的开幕词之后，站在旁边的冼星海举起手中的指挥棒，指挥成千上万的民众同声歌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前进！中国的青年！挺战！中国的青年……”“我们唱着歌，赞美新中国……”接着水上歌咏大游行开始。在浩浩荡荡的长江之上，动员来的几百只木船和轮船载着高举火把的歌咏队员，由武昌汉阳门轮渡码头出发，排成队顺江面下，船队连绵数里，象一条火龙破浪前进，抗战歌声和杀敌的口号声在江面上此起彼伏，蔚为壮观。游行的船队经江汉关一直到达现江岸区江面。这次江上歌咏游行集会，曾被外国报纸誉为“古代希腊以来，最伟大的露天演出。”面对这场面，郭沫若兴奋地说：“冼星海、张曙他们真有大本领，在几天工夫中，不知从哪里产生了这么多歌咏队来！”

1938年8月9日武昌举行“保卫大武汉火炬歌咏大游行”。当时日寇以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约五十万人，在空军、海军的掩护下，分五路由东向西围攻武汉，中国军队以一百万的兵力抗击日寇，武汉会战正在武汉外围激烈进行。那天下午五时开始，武昌各民众歌咏团体唱着歌走进武昌公共体育场（阅马场附近）。冼星海指挥场上五千多人的歌咏大军齐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保卫大武汉》、《中华民族不会亡》等歌曲后，浩浩荡荡的队伍便进入武昌闹市区，宏亮的歌声充满了街道。接着歌咏的队伍又举着火把坐船过江到汉口，与聚集在汉口三民路孙中山铜像前

的汉口火炬歌咏队伍汇合。汇合后的这支一万多人的火炬歌咏大军在军乐队伴奏下，在汉口闹市区游行，歌声、口号声显示了中华民族在敌寇威胁下不屈不挠的抗战意志。

三、把抗战歌咏推广到工农兵中去

冼星海深知歌咏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其它部门一样，其工作对象是广大民众，特别是工农兵民众，只有工农兵民众觉醒起来组织起来进行人民战争，抗战才能胜利，因此他努力把抗战歌咏推广到工厂、农村、军队中去。例如，当时武昌北郊下新河至徐家棚一带是工厂区，有不少纺纱厂和火车修理厂，1938年初，冼星海便带领他指导的汉口海星歌咏队全体队员过江来为这里的工人演唱，在他的指挥下，队员们演唱了《救国军歌》、《新中国》、《顶硬上》、《起重匠》等歌曲；演唱之后又分别向这里的工人们教唱。这样的活动，不但受到广大工人热烈欢迎，而且也歌炼了歌咏队员组织群众歌咏的能力。

1938年夏天，武汉会战正在武汉外围激烈进行，武汉形势危急，三厅一方面安排从事抗战宣传工作的文化人疏散，一方面对这批文化人作组织调整工作。许多文化人被三厅收编起来，进入国家正式编制，成立了九个抗敌演剧队、四个抗敌宣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并陆续派往前线和内地。冼星海、张曙、赵启海在昙华林三厅主持了歌咏人员的报考、考试和录取工作，被录取的人员由三厅编为“抗敌演剧九队”（队长徐桑楚）进行集训。

1938年9月下旬，三厅指派抗敌演剧九队到武汉外围前线阵地金口、花山、阳逻等地进行一系列劳军演出活动。第一站到武昌县的金口，是冼星海亲自领队去的。那天冼星海穿了一身整洁的军委会中校军服，和队员们一起坐金口部队派来的卡车抵达金口江防部队某师营房。在驻军长官陪同稍事休息后，连队士兵分片集合，或在广场，或在营房前面，由演剧九队队员分散去教唱《救国军歌》，士兵们高唱“装好子弹，瞄准敌人！一枪打一个，一步一前

进！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由于这支歌易懂、易唱，很有教育意义，教唱不到一小时就完成了。

晚饭后为驻军演出。演出的舞台是驻军临时用钢丝绳绑扎好悬吊在空中的，台板之间缝隙很大，台上灯光很暗，四周没有护栏，九队的队员们爬梯子上去，见要在这样的舞台上演出，都怕掉下来，战战兢兢的。但在驻军师长讲话之后，冼星海在热烈的掌声中站出来指挥演唱时，队员们的心又平静了下来，全神贯注，放声歌唱。演唱之后，队员们演了当时流行的独幕剧《三江好》、《打鬼子去》。最后是冼星海指挥台上的队员们，同时也指挥台下的驻军官兵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和《救国军歌》。由于《救国军歌》是驻军官兵当天学会的，所以他们唱得格外起劲。

第二天清早，队员们在贴出集体创作图文并茂的《战歌》大墙报时，就有驻军附近的农民成群结队而来，要求队员们再演一场。驻军领导不仅一再要求再演一场，甚至还邀请九队到该部队的其它驻地演出。显然，他们已经见到歌咏等文艺宣传，对鼓舞士气的作用了。冼星海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第二晚的演出，由于队员们对登高台演出已经适应，又增加了照明，还有前一夜演出的经验，故效果比前一夜还好。

这次演出之后不久，冼星海因武汉沦陷已成定局，再加上国民党方面对抗战群众歌咏活动愈来愈阻挠限止，使他很感苦闷，便接受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信的邀请，北行去了延安，结束了他在武汉的抗日歌咏活动。

武昌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武汉大学的学生们立即行动起来，要求校务委员会打电报给南京国民党中央，敦促国联依照制裁公约第16条，一致对日实行经济绝交，并采取共同军事行动制裁日本侵略者。10月2日，武大学生与教师一起集会，商讨抗日救亡的具体行动。会上成立了武大抗日救国会，决定出版抗日刊物，进行抗日宣传；组织“义勇军”，从事实际的救亡运动。不久，武大几名师生到国民党武汉行营请愿，要求发给武器，以备抗日。12月6日，武汉大学的学生汇同其他学校的学生代表计150人，组织了示威团，策应北平南下示威团与全国其他学生代表赴南京请愿示威活动。同时，武大师生还开展了抵制日货活动。1932年9月，他们签名发誓，在东北国土未收复以前，坚拒购买日货。为支援前方的抗日将士，他们还开展了募捐活动。据武大校史记载，1931年到1933年，他们共募捐现款3,600元，棉背心1,016件，毛巾1,300条。

其他学校的学生也纷纷行动起来。湖北省立第二中学的学生何功伟为激发大众的忧患意识，自己印刷了大量的“田中奏折”，作为反面教材以唤醒人民。他还组织了二中“抗敌后援会”，带领学生走上街头，进行抗日宣传。不少学校还纷纷组织了各种读书会。湖北省立师范学校黄成章组织了“都府堤十八号”读书会，湖北省立高级商业学校，有何功伟、司马成淑组织的读书会，武汉大学有陈宽、叶君健、李厚生、石秀夫等组织的各种同乡会、读书会等。在读书会里，他们广泛阅读进步书刊，研究马列主义，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消息传来，武昌的青年学生纷纷行动起来，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

华中大学的学生陈敌章、刘济安、刘锡藩等，冲破国民党政府的禁令和学校当局的控制，率先响应北平爱国学生运动。12月10日晚，他们在学校思殷堂开会，酝酿成立学生自治会，声援北平学生运动。武汉大学工学院的学生李厚生、魏泽同收到一封从北平辅仁大学寄来的信后，立即将信写成大字报公布于众，并在文学院的大字报旁，挂上一把菜刀，旁边贴着纸条：“谁撕掉就以汉奸论”！与此同时，湖北省立高级中学、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等校学生也纷纷行动起来。为了团结起来共同战斗，学生们一致要求成立一个共同的抗日组织，以统一领导全市的学生运动。12月12日，武汉市第一次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席会议在华中大学召开。武昌的华中大学、省立高级中学、省艺术专科学校、中华大学等多所学校代表几十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声援电文、告全国同胞书和决议。在给北平学生的电文中，表达了“诸君奋发前驱，同人誓作后盾”的决心。在《告全国同胞书》中写道：“华北事件发生以来，我们沉默着，观望着，期待着，希望有一个合人意的结果出来，希望我们国家的主权不致丧失纤微，国家的领土不致减少丝毫。几个月来，我们身体虽在课堂里，我们的灵魂却老早飞到华北去了。”并表示“中华民族的主权，任何人不得侵犯，我们誓死抵抗侵犯者……”最后，各校代表一致同意成立武汉市学联，以便领导全市学生运动。12月15日下午，武汉部分学校的学生代表在华中大学博育室举行了联席会议，会议由武大代表许升阶主持，并通过了以下议案：（1）通告武汉中等以上各校选派学生代表2人出席第二次联席会议；（2）通告由华中大学起草；（3）联席会议定于17日下午2时在华中大学礼堂举行；（4）通告由武汉大学、华中大学各派学生分